

序一

汪琪

就像開車上路不能沒有後視鏡，任何一個學術社群也需要不時回顧過去——「鑑往」方能「知來」。本書代表的，便是作者們對華人傳播研究在過去數年、以至數十年間所展現學術風貌的描述、分析與評論，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他們對於未來的展望。

特別可貴的是，這些分析不只透露出華人傳播學者研究主題的分布與數量，多位作者還點出了這些研究成果在華人以至於主流傳播學術的意義、價值與貢獻，例如中國發展傳播研究關注草根、強調底層實踐的取向（張國良），遙遙呼應印度學者近年頗受國際重視的庶民研究；學者對於香港媒體與政治變遷的分析，包括李金銓與陳韜文教授針對新聞媒體報導社會運動所提出的「抗爭範式」，以及區家麟博士提出的「結構性審查」概念如何影響國際傳播研究（李立峯）；華人計算機傳播研究以社會科學指導計算方法，改變了過去以計算方法指導社會科學的做法、並彌補過去論述與方法的盲點（張倫、彭泰權、王成軍、梁海、祝建華）；以及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在論述上走向跨學科、在方法上重視整合、視野上由本土而全球，和微觀化與深化的趨勢（徐來、黃煜）等。本書內容涵蓋的範圍遍及媒體傳播研究領域，作者又多為兩岸三地各個次領域的權威，因此對於任何一位希望一窺華人傳播研究貢獻與最新進展的讀者而言，它都會是重要的依據。

但如果我們認為出版本書只是要單純的「回顧」，就大小看了編輯們的雄心。「回顧」只是途徑，真正的目的已經在書名標示清楚——就是要直接面對華人傳播研究問題的核心：由傳承到創新的路徑。在全球化與政府政策的帶動下，近年來華人傳播學者的研究發表在質、量與國際能見度上都大幅提升。然而和其他歐美以外地區的許多學術社群一樣，伴隨著快速增長的卻是一股焦慮感：一種「為他人作嫁」的疑慮，以及因本土理論論述無法開展而引起的不安情緒。這種焦慮感反映在過去眾多華人傳播學者發表的著作，以及舉辦的研討會主題，也在本書篇章的字裡行間迴盪。

由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來看，早在1940年前後，楊開道、吳文藻與潘菽等社會學與心理學學者，便已經表達對依賴西方理論的不滿，並提出「學術中國化」的呼籲。傳播研究起步較晚，有關中國化的呼籲與著作也遲至1970年代才出現。¹但過去數十年來華人傳播學界有關本土化、中國化與中國特色研究的討論從未消失：研究需要貼近自己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這不只包括提出的研究問題；分析所依據的理論架構、甚至使用的方法都應該來自、並回饋到這片土地。理由很簡單：由歐美所發展出來的所謂「普世」理論反映的，其實是西方的價值與需求。正如後殖民論述所點破的，即便現代化之後影響力遍及全球，歐美同樣是世界中眾多「本土」的一個。²很遺憾的，由於定義與標的模糊，過去相關論述經常陷於本土、本土化，以及中國化的泥沼中無法脫身。因此本書跳脫本土化論述的糾纏、直指研究與理論創新，毋寧是明智之舉。

有關本土化的辯論眾說紛紜，然而華人學者、包括本書作者對於一些現象的觀察與原則的重視，卻並非沒有共識，例如華人社會的特殊性、理論論述與知識產出的貧乏、居於弱勢的焦慮與危機感，以及創新與對話的重要性等等。其中李金銓教授在本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強調的對話，以及胡翼青教授所觀察到學術社群內部的溝通問題，更點出了創新的關鍵。

過去華人學界談創新，並不常注意到對話的重要性。實際上兩者關係密切，不僅僅因為對話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盲點、刺激省思，

而是整部歐洲思想史，以及包括傳播理論在內的社會科學論述，都可以說是經由對話發展出來的。以哲學語言來說，這種特殊的對話方式就是思辯法 (dialectics)。作為西方思考方式的骨幹，思辯法很少出現在研究方法或理論的教科書裡。在歐美的教育體系，思辯的地位等同華人傳統教育的孔孟之學，由小學階段開始就深植腦海，不需要在大學階段再大張旗鼓的提出來。不巧的是，我人吸取西方知識，注重的是專業知識技能，也就是大學與研究所階段的教育，如此不只遺漏了思辯的思考訓練，而且我們在小學與中學所打下的基礎，恰恰不利於思辯式思考。

思辯法源自希臘，通常由參與對話的一方挑戰對方的主張，評論他的證據是否完善，邏輯是否周延等等；同樣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主張，並證明它「更勝一籌」。今天在法院及選舉辯論，我們都可以看到典型的思辯攻防。但對於華人學者來說，思辯方式的對話，卻有著說不出的驚扭。中國知識份子的修養首重謙和，然則思辯不但要求我們打破和諧挑戰他人，還要求我們老王賣瓜、說服別人自己的主張更優越。然則現實是，在西方學術的場子，確實沒有謙和的空間；沒有主張就沒有看法；如果對於西方觀點只有同意與接納、沒有看法，又如何對話、推展論述？

由歷史上看，對話絕不只在西方思想的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思想發展的黃金年代——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家之間的對話十分熱絡，攻防間所提出的各種主張，到今天依然精彩。此外，挑戰的對象不僅在社群內部，也可以超越時空。孔子推崇周公制禮作樂，然而經歷時代嬗變，對《周禮》他卻認為必須「因革損益」、絕不可照搬；³只要道理說得通，不合的就創新。華人學者不習於思辯法講究的挑戰式對話，大可走孔夫子的途徑，由體會、省思而創新。⁴不幸的是，漢武帝獨尊儒術；隋以降，儒學更成為科舉必考科目，士人們無不致力內化聖賢之學、改造自我。千餘年後，中國知識份子的「主體性」早已奄奄一息。當傳統經典的地位被科學理論所取代，在西方旗幟鮮明的「普世」論述面前，立刻落入不接受不行、接受卻也不很行的窘境。

事實上，將理論視為必須學習的「經典」，是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思辯傳統裡，即便是通過無數嚴格檢驗的權威理論，也永遠是不確定、需要被挑戰、修訂、而且可能被推翻的。以對話形式進行研究的最終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將理論知識進一步推向科學真理。「永恆不變」與「放諸四海皆準」並不是理論的本質而是終極目標；而學術研究的目的，是讓它更接近這個目標——即便只接近了一丁點。西方的理論，因此並不是一雙國際標準版的皮鞋，研究的目的當然也不只是要檢驗這雙鞋合穿或不合穿。

在思辯脈絡下同樣值得注意的，就是只要邏輯清晰、理據周全，我們完全可以、應該、也被預期會根據自己的體會、經驗、所身處的時空環境，以及社會文化價值與需求——也就是我們的「本土」——來對他人提出質疑、挑戰既有的理論與概念，並建構自己的論述框架。這是希臘以來，所有西方學術中人一貫的作法。在現代化席捲全球之後，「西方」逐漸成為「普世」的代名詞；同一時間，「非西方」在不知不覺中，竟成為科學研究所需要排除的「特殊」。

近年後殖民論述有關「歐洲中心主義」的評論揭發了「普世」背後的西方偏見，然而主流論述的話語權卻仍然牢牢的控制西方學界手中。因此要建立對話，即便我們希望對話的對象是其他學術邊陲、不是西方，也只有循此途徑。而要建立對話，華人學者勢必比西方學者多走一步路，便是透過文化轉譯，將傳統觀念、價值或獨特行為模式，以現在國際通行的學術語言帶入文獻脈絡。但即便多了功夫，在執行面上，由本土的「特殊」接壤「普世」論述，卻是順理成章：則「明鏡本無台，何處惹塵埃」；我人糾結於本土與普世之間的取捨，所為何來？

上面的質疑看似有理，實際上在主流論述的脈絡，一旦連我們自己也認了「本土/特殊」的大帽子，由特殊直通普世這件事就變成「國王的新衣」、能作不能說；要挑明了講不是不行，但必得先面對隱身西方傳統的另一大支柱：「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dualism）。世界上主要的思想傳統，大多具有二元的要素，差異在兩者之間的關係。根據歐洲傳統模式，二元不但是互不相屬的兩個極端，而且彼

此對立，絕無妥協；特殊與普同如此、東方與西方亦然，正如英國詩人 Joseph Rudyard Kipling 廣被引用的詩句：「哦，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這一對永不相遇。」⁵ 在二元對立與機械主義式的框架之下，除了存在著宰制與被宰制的緊張態勢，二元之間的互動、互通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經常不被重視、接受，甚至是被隱而不宣的。⁶

和思辯法一樣，二元對立思考模式的影響力貫穿西方哲學與科學理論，期間許多學者的挑戰，始終沒能撼動它的主流地位。相對的，華人所習慣的思考方式，卻更傾向於陰陽的二元觀；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者「相輔相成相生相盪」的靈活互動關係。換言之，中國二元的世界觀既不極端、也不對立。因此華人學者即便陷入本土/西方、特殊/普世的陷阱，也往往會依據自己習慣的世界觀來作判斷，認為任何二元或多元都可以經由互動而融合、匯流與相互滲透、兼容並蓄、化解對立。然而由僵化的二元對立觀點來看，雙方既是處於宰制與被宰制的緊張態勢，何來平等互惠的融合？何況融合與混雜並無不同？至於「中庸之道」，簡直就是學術上的「騎牆」。換言之，對於許多拘於二元對立思考的西方學者而言，這種論述基本上是沒有立場與主張的；意義不大、也不具說服力。

在歐洲思想史與社會科學研究文獻中，有許多論述可以證明，要破解二元魔咒絕非易事；但在概念上重新建構二元之間的關係，卻並非不可能。我在評論媒體研究所謂「主流典範危機」時，曾有闡釋與擬議 (Wang, 2018)，就不在此浪費本書篇幅。Kipling 上述那句流傳甚廣的詩句並不是他的結論；接下來他還寫了鮮為人知的兩句：「即便來自世界的兩極，當兩個強人遭遇時，東/西、界線、種族與出身都不具意義。」⁷ 對於華人學者來說，中與西、本土與國際間的對立與差異可以是動力、也可以是阻力，但一切必須回歸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創新。

正如本書的幾位作者指出的，創新是學科與學術研究的核心；創新不全然依賴對話，對話卻是創新主要的動力。不幸的是，面對新媒體爆發的年代，在傳播學界，理論發展停滯、溝通不良卻是常

態。不僅中西以及跨學科的學術對話有待努力，主流與華人傳播研究社群內部同樣出現溝通問題。有學者觀察到，近年主要國際期刊所發表的著作中不但少見理論論述，而且大多數學者對於別人提出的理論和觀點不是視而不見，便是不置可否；其結果是研究領域的分化與片斷化。⁸無獨有偶，胡翼青教授在他的篇章也提到，中國傳播學界有「自說自話、自娛自樂」、最後形成「碎片化的知識景觀」的現象。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有關本土化、特殊化與研究特色的討論也不例外。對於過去種種，黃旦教授感覺「談不上什麼交鋒」；一些「非黑即白式的你來我往，沒有對話」、甚至「論題壓根就沒有展開」；「三聲起身砲之後，一片寂靜」。⁹他的看法或許不中聽，卻是中肯。

上述主流與華人社群「失語」的情況容或相似，成因卻截然不同、所導致的後果也不完全一樣。對於華人學界而言，欠缺對話最令人憂心的後果，是在尋找傳承到創新的過程中重複地走冤枉路。前事不忘、後世之師；華人傳播學界對於產出理論知識的焦慮感不斷催生「自我檢討」，檢討卻萬萬不可次次均由原點出發。過去的幾年間，包括陳韜文、黃旦、黃懿慧等華人學者，都曾針對目前困境提出具體看法、也得到一些回應，這些討論都值得繼續推展。如何避免檢討過去所激起的火花在一次又一次的起身砲之後灰飛煙滅，考驗著我們的決心。

所有關於本土研究的討論，絕非否定現有成績；而是來自於「付出」應該得到「更有價值回饋」的信念。用Robert T. Craig的話來說，理論代表看法，¹⁰那麼無法產出理論，就是拿不出看法，也無由參與對話。除非我們決心集體與世隔絕、千山獨行，理論創新即便困難重重，也必須一步一腳印、堅定前行。然則起身砲之後的那一片寂靜，要如何打破？

華人傳播研究的成就，得來不易；過去百餘年，香港成為中西交會的門戶，在學術交流方面，也有人才薈萃、國際視野與本土資源兼具的優勢。十餘年前，香港中文大學與浸會大學的傳播學者攜手合作出版的中英文傳播學學刊與專書，很快便成為中外學界交流

的重要平台。這些刊物與著作支撐了研究動能、也引領論述方向；可以說充分發揮了傳播研究在華人世界對內、與對外發聲的功能。在維護華人傳播學界一次次自我檢討之後所爆發的火花、與推動對話與理論論述的發展，我對兩校學者建構的此一平台，充滿期待。

註釋

- 1 學界對於中國傳播研究的努力，一般認為起自余也魯教授在1978年所舉辦的研討會；不過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默默耕耘，方鵬程在1975年在台灣出版的《先秦合縱連橫說服傳播的研究》便是一例。
- 2 這是後殖民論述提出的觀點，見Chakrabarty (2000)。
- 3 「因革損益」出自《論語·為政》，即傳承(因)、革新(革)、揚棄(損)和創新(益)。
- 4 詳細說明請參見拙著《本土研究的危機與生機》(汪琪，2016)。
- 5 這一段詩句最早出現在Kipling在1889年發表的作品；黃旦教授(2013)也曾引用。
- 6 有關二元對立的討論，見拙著Wang (2018)。
- 7 參見黃旦(2013)。
- 8 有關這個現象的討論曾經出現在多篇期刊論文，包括Boromisza-Habashi (2013)、Corner (2015)與Zelizer (2015)。
- 9 參見黃旦(2013)。
- 10 見註7，Boromisza-Habashi (2013)。

參考文獻

- 汪琪 (2016)。《本土研究的危機與生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黃旦 (2013)。〈問題的「中國」與中國的「問題」——對於中國大陸傳播研究「本土化」討論的思考〉。黃旦、沈國麟(編)，《理論與經驗：中國傳播研究的問題及路徑》(頁35-6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Boromisza-Habashi, D. (2013). Which way is forward in communication theorizing?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T. Craig. *Communication Theory*, 23(4), 417-432.
- Chakrabarty, D.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rner, J. (2015). The many spaces of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 dispersed future. *Communication Theory*, 25(4), 416-419.

Wang, G. (2018).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Moving beyond ontological du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8(3), 235–253.

Zelizer, B. (2015). Mak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matter. *Communication Theory*, 25(4), 410–415.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序二

朱立

任何行業都需要創新與傳承，才能永續，企業如此，學術研究如此，新聞傳播研究也不例外。

兩岸三地不少學子希望能躋身新聞傳播學科，以便學習和研究新聞傳播的理論與實務，說它是兩岸三地的「顯學」也不為過。各所大學的新聞傳播學院成立有早晚之分，但它們既有競爭也有合作，都希望能為新聞傳播的理論或實務盡力，為學科的創新與傳承出一分力，使學術或行業不斷進步而且永續下去。

文化是有生命的，創新與傳承正是使新聞傳播研究具有繼起生命的不二法門，懂得創新與傳承的文化不會被時間淘汰，反而會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強。今天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和以前已太不一樣，這是兩門學科都有創新與傳承的結果。雖然過了六十多年，新聞傳播研究仍然興盛，這都得拜創新與傳承之賜。這本選集的作者涵蓋兩岸三地學者，他們都很關心新聞傳播研究的永續，這是創新與傳承做得好之主因：作者對傳播具有深刻的了解，有了深刻的了解，談創新與繼承便水到渠成了。

簡單地說，沒有創新，就沒有傳承，兩者相輔相成。一定要傳承值得的東西，這個值得的東西就是創新，傳承了不值得的部分，就會愈傳愈糟，任何事物都會倒退，甚至衰亡。兩岸三地的幾家有歷史的學府的學術愈來愈強，能夠走向世界，與各地的同行一爭長

短或為他們所稱頌，早非罕事。這和1990年代前許多學府的新聞傳播學系只培養實務畢業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創新與傳承之功也，這本選集就是華文新聞傳播研究受稱頌的原因之一！

創新與傳承不容易，兩者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新的巨人會不斷出現，我們必須繼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搜索，因為站得高，才看得更遠、看得更清楚，更名為中華傳播研究找到方向，為它的創新與傳承而努力。學者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使中華傳播研究能不斷創新、不斷傳承，而中華傳播研究也因此生生不息，永存下去。當然，要是懶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遠一些、看清楚一些，創新就不容易出現，減緩了傳承的速度，甚至沒了傳承。我們的新聞傳播研究來自西方，如果創新與傳承變慢了或是停止了，說不定它會和出現時差不多，而和西方一爭短長就更不可能了。當然，學者自己也可能變成巨人或小巨人，讓同行站在肩上而繼續創新與傳承，共同為華人的新聞傳播的研究而努力。

研究中華傳播的學者，精通外語的居多，這是好現象，表示中華傳播研究永遠有新的養分注入，只要肯吸收，就能保障中華傳播研究的創新與傳承。西方文化可以挑戰我們的思考，而自己祖先的古籍也有此功能，1990年後也有不少華人學者從古籍中找靈感和研究，他們無疑豐富了對新聞傳播的研究，可說貢獻不少。莊子看到魚兒游來游去，就說魚兒很快樂，旁觀的人就說你又不是魚，怎麼會知道魚快樂或不快樂，莊子答得也妙，他說：你又不是我，不可能知道我曉得魚兒快樂或不快樂。莊子的故事說明動物既有理性也有感性，人當然兼具理性與感性，因此研究傳播也該有理性與感性的思考。有時我們該用理性研究理性，但有時我們則該用感性研究感性。當然，我們也可用感性研究理性。然而什麼情況下該用「理性研究感性」或「感性研究理性」則要看我們的思考了，其實這也是中華傳播研究的創新與傳承，這件事並非易事，可說知固難行亦不易，而這正是中華傳播研究對整體傳播研究最可能有所貢獻之處。

童話故事裡《國王的新衣》中的國王固然笨到被裁縫所騙，但看熱鬧的人也未免太世故了，要讓一個小孩說出國王沒穿衣服的真

相。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學者不應太世故，因認識太多同行而對問題視而不見，新進學者雖然涉世未深，但他們如敢胡言亂語，便在無形中為傳播研究的創新與傳承作出了貢獻。中華傳播研究源自西方，學術期刊裡華人學者的論文愈來愈多即為明證。

本書的作者，包涵兩岸三地，這些學者對西方以及中華地區的新聞傳播研究都有相當了解，他們分享了長期研究過程中得到的經驗，也看到了中華傳播研究尤需不斷創新，才值得傳承；唯有不斷地創新與傳承，中華新聞傳播研究才能永續，對整體的傳播研究才有貢獻。因此，本書非常值得一看，從中學習什麼值得創新、什麼值得傳承。當然，讀者也可能覺得本書沒有搔到癢處，或只搔到一部分癢處，沒有真正做到創新與傳承。有時候，只有部分做到或完全沒做到反而更能刺激學術思考，貢獻更大。做到了，我們只會喝彩，沒做到則令我們反思，受益反而更大。David Freud 倡議研究潛意識，我們看不見潛意識，卻無法否認它的確影響著我們，我們想了想，覺得他很有道理，潛意識值得細究，也為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開拓了一個新領域。中華傳播研究的學者受到了刺激，但這方面的發揮似乎還不夠。

新聞傳播係人類獨有的天賦，創新與傳承都不簡單，創新可能來自外來文化的衝擊，也可以是對自身文化深思的結果，當然，它可能先只有心血來潮，然後經過思考，才有創新與傳承。就企業言，創新意味著產品或服務變好、利潤變多，創新與傳承的職員也可能更為公司器重，因此企業的創新更有吸引力，它的效果往往是立即的，常常敲鑼打鼓唯恐旁人不知。傳承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然而學術研究則不然，往往無聲無息，創新與傳承是種自我滿足，也就是心理學家 Abraham Maslow 所說的自我成就 (self actualization)，學者不太可能從創新得到即時的酬勞，只能在發表論文時，得到一時的快感，隨升級而來的加薪也可能不是立即的，何況說不定創新者本身早已升到了頂，也就只能自得其樂了，頂多也只和同行討論一下，過過乾癢。

創新與傳承常常是一體之兩面，有了創新，傳承往往隨之而至。沒有創新而只有傳承，那就是復古。新聞傳播研究復古是好

的，但新聞傳播研究本身也復古可就沒前途了。新聞傳播研究少說也有半世紀了，你要是認不得它原本的樣子，這得歸功創新與傳承使新聞傳播研究有了新生命。創新絕非標新，後者是立異，在學術界是不會引起共鳴的，就算引起了，它也不會持久，因為這種「新」往往缺乏依據，根本站不住腳，君不見學術論文都有憑有據，才經得起時間和同行的考驗。

從這本選集看，創新與傳承的方法是多樣的；比較華人社會的多元是一種方法，馴化 (domesticate) 引進的西方的傳播研究和使華人社會的傳播研究從邊陲到中心的努力都是創新的方法。研究互聯網絡、手機或未來出現的新科技都是創新。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是美國大眾傳播研究的大師和創始人之一，他在 1977 年至 1978 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客座了一年多，1979 年 2 月又訪問了上海復旦大學和北京，將大眾傳播學引進了剛剛開放的中國。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施拉姆幾乎成了傳播研究的代名詞，在創新與傳承之下，提到他的人愈來愈少了，而他自己恐怕也不認識今天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研究了。我們忘了施拉姆，而今天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研究也和剛引進的時候大不一樣了，施拉姆如果重遊中國大陸和香港，見到自己以前沒見過的新聞傳播研究，說不定遇到的年輕一代還沒聽過他的大名呢！雖然如此，我想他會為這新面貌感到高興，見到新聞傳播研究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有了發展，他也會感慨萬千。沒想到他的理論竟發展到連自己都不認識了，但他見到了進步，還是會高興的。

這本選集是一本以「傳承與創新：中華傳播研究 40 年」為題的著作，是各位學者的心血結晶，無論你是否同意書中作者的觀點，他們都有貢獻。說不定以後談新聞傳播研究的選集會和本書完全不同，這也是新聞傳播研究創新與傳承的結果。我想這應該是好現象，表示我們又向前走了一步，新聞傳播研究取得了新生命，還會繼續下去。

其實，學術期刊裡的每一篇論文都在創新與傳承，論文未必提到這些字詞，但新聞傳播研究的期刊能夠出版數十年而不衰，而且種類與發行數量愈來愈多，這固然是因為學者愈來愈多，但也表示

新聞傳播研究是生生不息的。在本書之前、之後肯定還有許多其他的選集，他們未必用上新聞傳播研究創新與傳承的字眼，但這些無名功臣多半在課堂上默默地耕耘，做著同樣的工作。

新聞傳播研究有了優秀的接班人，我們是不必擔心這門學術的創新與傳承的。

2021年2月28日

完稿於澳大利亞布里斯本市暫未居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